

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



杭州商学院学报编辑室编

杭州商学院学报丛书

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

第一辑

杭州商学院学报编辑室 编

一九八二年九月

编 者 的 话

商业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大约在商朝初期，我国的商业已初步形成。它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是一份值得批判继承的宝贵遗产。浙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上地处东南沿海，海上交通便利，因而浙江的内外贸易历来都是比较繁荣发达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浙江商业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作为我们今天改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借鉴，充分发挥商业在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给、繁荣经济中的作用，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决定陆续编印《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供商业工作者和财贸院校师生参考。

这册是《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第一辑，选编了我们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商业史研究工作者撰写的十三篇关于浙江海外贸易史方面的论文，除了《宋代浙江海外贸易探索》、《试论古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试论浙江古代丝绸贸易的发展》等篇曾在《杭州商学院学报》上刊载过以外，其余各篇都是首次发表。

我们编辑《浙江商业史研究文选》缺乏经验，又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商业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古代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兼论浙江历代的海外丝绸贸易 陈 炎 (1)

试论浙江古代丝绸贸易的发展 金 敏、慧 馨 (17)

唐、宋时期的浙江丝绸出口 潘以红、王贞平 (31)

试论古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 林正秋 (36)

关于宁波港古代海外贸易几个问题

的探讨 林文明 (45)

古代杭州及其外港的海外贸易 吴振华 (57)

宋代浙江海外贸易探索 徐 规 (71)

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倪士毅、方如金 (84)

宋代温州设立市舶的原因 周梦江 (93)

温州直至南宋开辟为海外贸易港口

原因探讨 陈 龙、周厚才 (106)

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 林树建 (114)

试论明代浙江的海外贸易 徐明德 (125)

清代的浙江海外贸易 孟文镛、史 林 (138)

附录:

有关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几个名词解释 徐武康 (148)

中国古代“朝贡贸易”与“走私贸易”

(I) 走私 走私贸易与朝贡贸易的区别

(II) 朝贡 朝贡贸易与走私贸易的区别

(III) 互市 互市贸易与走私贸易的区别

(IV) 通商 通商贸易与走私贸易的区别

关于几个名词的解释

(V) 朝贡 朝贡贸易

(VI) 走私 走私贸易

(VII) 互市 互市贸易

(VIII) 通商 通商贸易

(IX) 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

关于几个名词的解释

(X) 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

(XI) 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

古代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兼论浙江历代的海外丝绸贸易

陈 炎

前 言

我国是最先发明养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美丽的中国丝绸早在公元以前，就通过陆路和海路向国外传布。横贯欧亚大陆的西域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以对外进行丝绸贸易而闻名于世的。陆上除这条西北的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从我国西南通过缅甸向外传布丝绸的西南丝绸之路①。以上两条丝绸之路，虽然开始的时间很早，但都是陆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到了唐代中期，由于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陆路运输已不能满足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而逐渐为海路所代替。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发展起来的②。

浙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长江口和杭州湾一带，附近有许多良港。我国古代著名的海港，如杭州、越州、秀州、明州、温

①拙文：《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载《东方研究》1980年第一期和《世界史论文集》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1年第一辑。

②拙文：《略论海上丝绸之路》，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海上丝绸之路》，载《外国史知识》1982年第六期。

州、台州等都集中地分布在这里。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既有常年不冻的深水港，也有可供海舶靠岸的港汊；海面“风涛低小”，有便于各种船舶安全行驶的优越条件。时风在六至十月经常为东南偏南风，十至二经常刮西北偏北风。古代航海必须凭借风力，这种时风对航行无论北上南下，或东渡日本都十分有利。

浙江的内河航行的条件也很好。例如，从它的重要海港明州（今宁波）登陆，可循余姚江西上，渡曹娥江、钱塘江而直达杭州，再连贯大运河，衔接江淮京津，经济腹地很大，是比较理想的内河外海联运的吞吐港口和转运中心。浙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商品经济比较繁荣，出口物资比较丰富，市场比较广阔，许多商业繁华的城市，本身又正是海陆联运的贸易港。

浙江自古盛产丝绸，素有“丝绸之府”之称，同时又是造船和航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前者提供了丝绸外销的商品来源，后者又提供了丝绸外传的运载工具。这两者是古代海外丝绸贸易赖以发展的前提。由于具有上述这些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浙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路的主要干线和南海航路重要分支，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就浙江历代的海外丝绸贸易和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作些初步探讨。请学者专家们指正。

一、唐代以前，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浙江海外丝绸贸易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成王于越献舟”（《周书》）的记载，浙江一带的越人已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顺风，去则

难从。”（《越绝书》）浙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养蚕织绸的技术，以山东半岛最早，也最为著名，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时，采纳了谋臣范蠡和文种的建议，“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并号召全国上下大力发展蚕丝业以图复国①。范、文两人又吸取了丝织业发达的齐国的经验和引进鲁国的技术，从而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大发展。当时浙江的丝绸品种已发展到有：帛、丝、罗、纱、縠（音hù，一种绉纱）。如《加泰会稽志》说：“縠首见于越国。”越国美女西施“浣纱”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它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浙江诸暨一带的丝织业已经兴起。

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0年，在鄞县（今浙江宁波）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去蓬莱（今日本）。《后汉书》还提到：“会稽海外有东罍人……时至会稽市。”《三国志》也说：“其上（指澶洲）人民，时至会稽货布”。中外学者大都认为澶洲就是今日本。东罍人就是日本人（即徐福留下来的后裔）。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浙江已经和海外有了贸易。因当时还没有棉花，文中提到的“货布”不可能是棉布，很可能是麻制的“越布”或“布帛”（丝织品）。可见当时会稽（今绍兴）已经与海外有了丝绸贸易。《后汉书》还提到浙江上虞人朱儁“母尝贩缁（丝绸）为业，同郡周规……假郡库钱百万，乃儁窃母缁帛，为规解对”②。一个妇女经营丝绸贸易，被儿子偷去的丝绸价值百万，并能转手出售为其友还债，说明当时浙江已经有繁荣的丝绸贸易的市场。再从《国语·齐语》记载，远在西周时，就有“倭人贡鬯（畅）”来看，上述记载中的“货布”，理解为进行海外丝绸贸易，不是不可能的了。

①详见《史记》卷四一，中华校点本第1742页。

②《后汉书·朱儁传》卷七一。

三国以后，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到南北朝时已经赶上北方。日本累次遣使至南朝，从吴国带回精美的丝织品，于是日本出现了“吴服”。后来，日本来使又到江浙一带聘吴织、汉织、兄媛、弟媛四名女工，到日本去传授丝织和缝衣等技术①，促进了日本丝织技术的提高。

唐代以前，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还处于幼稚阶段，为了航行安全，中日航路早期都走北线。其走向是：从日本九州出发，经壹岐、对马，绕朝鲜半岛，横渡黄海或渤海，然后到山东半岛的登州，或再从山东半岛沿海岸线航行至扬州和建康（今南京）。日本到南朝的来使以及遣隋使和早期遣唐使走的都是这条北线。南线是在公元702年，由粟田真人率第七次遣唐使时才开辟的。最初从南岛发航，横越东海至扬州、苏州和明州（今宁波）。《新唐书·东夷传》还记载：“新罗（今朝鲜）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

从此，浙江的明州就成为遣唐使的主要登陆海港之一。除明州外，浙江的越州（今绍兴）、杭州、温州、台州（今临海）也都是对外的贸易港。著名的东海航路，就以明州港为主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最早的一条干线，浙江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二、唐、五代时，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中的地位

——这个时期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

唐初，全国统一，政治稳定，浙江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唐初浙江东道节度使薛兼训为引进北方先进的丝织技

①〔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1980第30—31页。

术，从军中“募未婚者，厚给货币，密令去北方娶织妇以归，得数百人携回越州。”（李肇：《国史补》卷下）于是浙江的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产量大增。据《通典》作者杜佑估计，天宝时仅庸调（税收名称）一项，每年总收入的绢布达二千一百万匹①。当时贡赋丝织品最多的是江南东道，而浙江就占其中的三分之二。所贡的丝织品名目繁多，以越州为例就有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綾、交梭綾、十样花纹綾、花纱、吴绢等。其他如杭州、睦州（淳安）、明州、湖州所贡的丝织品，种类之多也不胜枚举②。这些产品“薄如蝉翼、飘似云雾”，其工艺之精美可谓“巧夺天工”，成为唐代海外丝绸贸易中最受各国人民欢迎和喜爱的商品。

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派遣外交使节贡方物，而唐亦回赠礼品，实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日本政府遣唐使时，大使、副使、判官按等级赏赐大批丝织品，作为奖励和旅费。他们到中国后又受唐朝的赏赐，除赐国王、大使的丝绸外，判官以下的水手每人赐绢五匹，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赏赐赴上都的水手二百七十人，每人五匹，共赐绢一千三百五十匹③。日本的贡品除琥珀、玛瑙等珍品外，为沙金、银、绁，而中国的赏赐则以彩帛（丝绸）、香药为主。这种交换实质上就是以“朝贡”为名的丝绸贸易。中国丝绸当时被称为“唐货”，运到日本后一部分通过内藏官出卖，王臣贵族心爱远物，无不以高价竞相争购④。中国的丝绸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喜爱。日本正仓院至今还珍藏着从我国唐朝传入的大批丝织品⑤。据《正仓院刊》记载：唐

①《通典》卷六《食货》。

②详见《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一。

③、④〔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卷134页和154页。

⑤〔日〕布目顺郎：《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绢》，雄山阁1979年。

代运去的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纈等名贵丝织品，促进了日本的丝织、漂染等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日本法隆寺也保存了不少从唐、宋时传入的中国丝织品。它们都是从浙江通过东海航路的南线传往日本的。这些珍贵的遗物，不但证明中国丝绸传入日本已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除朝贡贸易外，两国的民间贸易在唐代也很活跃。特别是在仁明朝（公元834—847年）中止遣唐使以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泛海兴贩的中国大商人如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都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多次往来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和台州之间^①。日本方面，如神御井等大商人也自备船舶来明州经商。这些商船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香药，以换取日本的沙金、水银、锡等等。

唐代明州不但和日本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也和新罗（朝鲜）、环王（越南）、尸利佛逝（印尼巨港）、占卑（苏门答腊）等国的商人通商。此外，还有来杭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他们贩卖中国丝绸，推销本国土特产，开店列肆聚居在杭州。今天，杭州的伊斯兰教古寺（在今中山中路）亦名凤凰寺，原名真教寺，就是一位在杭州的埃及大富商欧斯曼于唐时创建的^②。可见阿拉伯商人在浙江经商之久。

五代时的太湖产丝区是吴越国的疆域。都城杭州有一座纪念吴越王钱镠（音 liú）的“钱武肃王庙”，庙中有块石碑，上有“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碑文^③，这就是说，正当中原大动干戈时，钱镠却闭关自守，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由于这个地区社会比较安定，自然条件又比较优越，加上钱

①《中日交通史》第143—148页。

②杨永昌：《漫谈清真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③章楷：《蚕业史话》第16页。

缪重视丝织业的发展，这时浙江的丝织业已经超越北方，成为全国之冠，为以后宋、元、明各代的海外丝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北方战乱，江淮道梗，客观上也促进了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专门设立了“沿海博易务”，采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方针。同时它又广招海贾，大兴舟楫之利，加强与日本贸易，并几次派蒋承勋、蒋衮为使者，向日本献书信和馈赠锦绣珍品，使吴越的商船在日本受到款待。从浙江带去的商品以锦绣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的商品则以沙金等物为主^①。五代时，浙江除同日本进行频繁的贸易外，还同朝鲜、南海诸国乃至西亚阿拉伯国家都有贸易往来。苏轼曾称赞吴越“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②象犀珠玉非浙江所产，显然是南海诸国的舶来品。《吴越备史》还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阿拉伯诸国的总称）。”可见火油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浙江的。浙江外销的商品，以丝绸和瓷器最受各国人民所喜爱。上述的舶来品，绝大部分正是以浙江产的丝绸和瓷器交换来的。

唐、五代是我国对外丝绸贸易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历史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的时期。这时，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随之日益提高。

三、宋、元时，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这个时期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

两宋时，我国北方先后为辽、西夏和金所占有，政治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人口也随着向东南迁徙，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四

①〔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227页。

②苏轼：《表忠观碑》，《苏东坡集》卷三三。

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①一方面，增加的人口中有许多是技术很高的丝织工人，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大量增加，丝织品的销路激增，也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那时，达官贵族对外来的奢侈品需求日增，以丝绸交换舶来品的贸易也随之增加。又因局处东南一隅，市场萎缩，国库收入减少，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扩大海外市场，两宋政府对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比唐代更加积极。如开国不久，宋太祖就派内侍八人，带了大量黄金和丝绸分四路到南海各国邀请外商来我国通商。这是浙江丝绸大量外传的开始，也说明了丝绸在发展海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市舶贸易对南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高宗一再说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②这说明宋政权一再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其目的在于能对日益枯竭的财政有所弥补，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为防止钱币外流，宋政权于公元1219年下令以绢帛、锦绣、瓷器等物交换外国舶来品。这样，浙江生产的丝绸就大量地用于作为收买外国进口商品的货币，因为受到政府的鼓励，丝绸向外输出的范围和数量也就日益扩大和增加。

两宋时，浙江的丝织业由于受到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刺激，也比前代更加繁荣。正如李觏描述的，“茧簿山立，繰车之声连薨相闻。”③当时两浙路的范围，只占全国二十几路中的一路，可是它所缴纳的丝织品，却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反映了浙江的丝织业在全国所处地位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外丝绸贸易的发展，原来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这在宋人的诗歌中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 ②《宋会要辑稿》第3364页和3373页。 ③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十六《富国策》第三。

也有所反映，如欧阳修送祝熙载的《东阳主簿》诗中有“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①之句，可见当时城市的丝织业已经兴起。

两宋时，北方的贸易港为辽、金所占，就不得不转移到浙江的明州。例如，朝鲜和中国通航的海港唐代在北方的登州，宋代就移至明州。公元1032年“高丽遣使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②宋朝政府准许朝鲜的贡使从明州进京朝贡。从此以后，明州港同朝鲜的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就更加发达。由于来明州的朝鲜使节和商人日多，宋政权于公元1117年在明州兴建“高丽使馆”，作为专门接待他们的宾馆，同时，宋朝去朝鲜的使者和商人都从明州出发。政府还于公元1079年规定：凡商人去高丽，资金在五千缗者，必须在明州办理登记和领取“引”（出国护照）等手续，否则就以私贩违法论处③。这样，明州港就成了浙江各海港和广州、泉州港航行日本、朝鲜的必经之地。当时明州“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④两宋同朝鲜的官方朝贡贸易往来频繁。苏轼曾说：“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⑤。

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据《高丽史》记载，去高丽经商的浙江人很多。如公元1031年6月有台州商人陈惟忠等六十四人；1038年8月有明州、台州商人陈亮、陈绩等一百四十七人，1049年有台州商人徐赞等七十一人。另一方面，高丽也有大批商人来明州经商，即使去泉州、广州甚至去东南亚，也都先在明州停泊。《诸蕃志》卷上《新罗国》（今朝鲜）说：“商人…兴贩必先至四明（今宁波）而后再发，或曰泉之水势渐低，故必经由四明”。文中还提到朝鲜以人参、水银、麝香等药材，换取浙江的

①诗见《居士集》。②《宋史·外国三·高丽》卷四八七。

③《宋史·食货志》卷一八六《市舶》。

④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

⑤《东坡全集》卷三十二《奏议》三〇。

五色纈绢、瓷器、草席等。浙江和朝鲜输入输出商品在《〔宝庆〕四明志》中列有详细货单。浙江输往朝鲜的丝绸品种很多，有：綾、绢、锦、罗、白绢等，数量也很大。

浙江的主要贸易国仍是日本，来往中日之间的商船大都从浙江出发。这时，象以前由太宰府遣使贡方物，宋朝答其物直的官方贸易已不多见，大量的是民间丝绸贸易。例如，公元983年日本僧人裔然就是搭浙江商人陈仁爽的船，后来回国又乘宋商郑仁德的船，船中都装有丝绸。又日本太宰府所收藏的档案中，还有泉州人李充的报告原文：“自置船一只，纲首李充，助手林养，什事庄权，带货品五种：一种是‘象眼’（可能是丝织品名）四十匹，第二种生绢二十匹，第三种是白綾二十匹。（后两种是瓷器，略）”①李充是经过明州市舶抽解后，开往日本的。在这样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博多织”的纺织法。这一纺织法肯定是在镰仓时期受宋朝浙江一带丝织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藤原定家《明月记》中说：“近年来，无论上下各色人物，均喜欢穿用‘唐綾’（浙江产的丝织品）。实际上，却是都城的纺织工仿制的”。可见日本丝织品是在仿制“唐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浙江的明州港，位于黄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之间。两宋时山东半岛的港口为辽、金占据后，明州就成为东海起航线最重要的海港。除了与朝鲜、日本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外，从明州起航的商船还同泉州、广州的商船一起，航行于南海航线，同占城（越南）、真里富（柬埔寨）、暹罗（当时称暹和罗斛、今泰国）、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阇婆（爪哇）、麻逸（菲律宾）、乃至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丝绸的交换贸易。输往这些国家的丝绸

①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载《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转引。

名目繁多，有：假锦、生丝、锦绫、纈绢、丝帛、五色纈绢、皂绫、白绢、杂色帛等。中国商船到达哪里，哪里就以当地的土特产交换上述的丝绸和瓷器（绝大部分是浙江的产品）。这在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宋史·食货志》、《〔宝庆〕四明志》等都有详细记载。

元朝统一中国后，就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在浙江推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①的政策。

元时，浙江设市舶司的贸易港有庆元（今宁波）、温州、澈浦、杭州四处，是元朝市舶司最多，也是最集中的地区。澈浦是元时商贾往来的要冲之地，“远涉诸蕃，近通福、广”^②，温州“百货所萃，麀氓贾竖咸附趋之。”^③公元1293年温州并入庆元，公元1298年上海，澈浦也并入庆元，庆元的海外贸易就更加繁荣。浙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外销商品，由庆元向东运销日本、朝鲜，向南运销东南亚、南亚，向西运销西亚阿拉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沙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也运至庆元港再集散转运到各地。时人张翥的诗写道：“是那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④这是当时对庆元（宁波）港海外贸易兴旺发达的写照。

元代浙江除与日本、朝鲜有丝绸贸易外，还同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各国也都有丝绸贸易。温州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里，在《欲得唐货》中，把五色轻纈帛（丝绸）列为仅次于金银的商品，可见浙江丝绸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元人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对我国丝绸通过南海航路以贸易交换的方式传

①《续文献通考》卷二六。 ②《元史·食货》卷九四。

③黄缙：《永嘉县重修海堤记》《金华先生文集》卷九。

④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见《元音》卷九。

布到各国都有详细的记录^①。根据他的记录，几乎是这条航线通到哪里，哪里就有浙江产的丝绸和瓷器的贸易交换。从近年来沿这条航路所到各国已出土的瓷器来看，大都是浙江的产品^②。它和文字记载的情况，航路的走向，大致是符合的。所以把这条传布丝绸和瓷器的航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称它为“瓷器之路”或“丝瓷之路”），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前夕，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处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四、明、清时，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极盛时期中的地位

——这个时期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

明代，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时期。从宁波港通过东海航路同朝鲜、日本的丝绸贸易也胜过前代。这时，中朝两国互通有无。例如朝鲜盛产好马，而我国缺马，就于公元1393年以一万九千七百余匹丝绸，换取九千八百余匹好马。公元1427年又以绞纱（丝织品）换取好马五千匹资边用^③。这是我国丝绸输出数量最多的例子之一。可见浙江丝绸不仅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助于交通运输和军用物资的供应。公元1403年置市舶提举司于明州后，明州还设安远驿接待外国使节，同时又设高丽馆、波斯馆、红毛馆（在定海）、四明驿，接待贡使。如四明驿专门接待日本贡使。明代永乐时规定：必须持有明朝政府发

①拙文：《略论海上丝绸之路》附《岛夷志略》丝绸外传表，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

②林士民：《“瓷器之道”传友谊》，载《文物与考古》1981年第108期。

③《明史·外国一朝鲜》卷三二〇。